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1), 130-13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1836

Hans汉斯

流动与重塑：城市“老漂族”代际支持中的角色冲突与社会融入路径

王　丹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6日

摘　要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与“三孩”政策的推行，“随迁抚育”导致城市“老漂族”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群体在家庭场域中承担着关键的代际照料职能，但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却常面临着边缘化的生存境遇。本文基于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与社会融入理论，深剖“老漂族”在“家庭内部强支持”与“社区外部弱融入”双重场域下所产生的角色紧张与冲突。研究表明：在家庭私领域，“老漂族”面临着“家务照料者”角色过载与“自主个体”角色悬置的身份张力；在社区公领域，由于原本乡村熟人社会地缘与亲缘网络的断裂，其面临着社交圈窄化、文化适应失调等多重困境，进而引发深层的心理漂泊感与认同偏差。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缓解“老漂族”的角色冲突并促进其社会融入，需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协同发力：一是重塑边界清晰、代际均衡的“协商型家庭关系”以缓解角色紧张；二是依托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孵化非正式同辈互助网络，激活其“再社会化”的主动性；三是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其合法权益。本研究旨在为“老漂族”从“被动流动”走向“主动融入”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老漂族，角色冲突，代际支持，社会融入，再社会化

Flow and Reshaping: Role Conflic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Paths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Urban “Elderly Drifters”

Dan W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6, 2026

文章引用: 王丹. 流动与重塑: 城市“老漂族”代际支持中的角色冲突与社会融入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1): 130-136. DOI: 10.12677/ar.2026.1311836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upbringing" has led to a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urban "elderly drifters". While these elderly individuals undertake critical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household, they frequently find themselves socially marginalized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cities. Drawing up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Role Theor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tensions and conflicts experienced by "elderly drifters" under the dual context of "strong family-level support" and "weak community-level integra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within the domestic sphere, "elderly drifters" face a significant identity tension between the overload of their caregiving roles and the suspension of their autonomous individual roles. In the community sphere, the disruption of their original geographic and kinship networks leads to social barriers and cultural maladaptation, which in turn lead to deep feelings of psychological drift and identity deviation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itigating these role conflicts and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requires coordinated efforts across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first, reconstructing a "negotiated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clear boundar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balance to alleviate role strain; second, mobilizing community spaces to foster peer-support networks to stimulate opportunities for resocialization; and third, advanc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safeguard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assisting "elderly drifters" in transitioning from passive migration to active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Elderly Drifters, Role Conflic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ocial Integration, Resoci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与深度老龄化的交织，随迁老人——在大众舆论中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已成为流动人口结构转型中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流动人口监测报告指出，在我国高龄流动群体中，以照料晚辈(隔代抚育)和家庭团聚为核心目的而随迁的老人比例已占主体，他们协助成年子女在城市中立足，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后勤和家庭再生产支持[1]。

"老漂族"在微观上保障了双职工年轻家庭的正常运转，但在宏观上，其自身的发展权益与生存质量却长期游离于城市公共政策与学术视野的边缘。从原本高度同质化、低流动性的熟人社会骤然迁入异质性高、匿名性强的现代都市，随迁老人面临的不单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生存网络拔地而起、原有角色全面丧失的深层失序。既有研究多偏向从宏观自变量(如健康指标、社会福利)探讨流动老人的主观福祉，往往忽视了老人在日常代际互动与生活实践中复杂的主观体验。事实上，在子代的"家庭需要"与城市的"制度承接缺位"双重挤压下，"老漂族"正处于一种极为撕裂的"双重生存场域"之中：他们既是家庭内部不可缺少的照料核心，又是城市社区空间里无声的边缘看客。

基于此，本文引入角色理论与社会融入理论，探究城市"老漂族"在代际支持情境下的心理适应和角色拉扯。具体而言，本研究拟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在随迁抚育的结构化注视下，随迁老人如何应对熟

人关系网络断裂带来的本体不安全感？他们在家庭与社区的双重场域中遭遇了怎样的多重角色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如何演化为深层的生存焦虑，并倒逼其探索特定的再社会化调适机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构，本文旨在揭示代际支持不仅是一项无偿劳动的让渡，更是一场涉及地缘断裂、情感重构与权力协商的复杂社会适应过程，为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适老友好型城市提供理据。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老漂族”：随迁抚育下的非正式支持者

社会学视域下的“老漂族”特指那些为了支持成年子女在城市立足，特别是为了协助其照顾年幼孙辈而离开原籍地，随同子女共同生活并在异地居住三个月以上的老年流动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折射出我国转型期特有的“反向社会化”与“家庭代际契约”的变迁。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父权权威被削弱，年轻子女反向掌握了城市生活的资源与话语权。因此，“老漂族”作为技术和文化上的弱势者，被动介入子代家庭的生活，成为非正式的家庭照料支持者，这种特定的代际权力流变与多重挤压构成了其角色调适的制度与生存背景[2]。

2.2. 角色冲突：代际互动中的多重角色失调

依据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社会互动如同舞台表演，个体通过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来进行“印象管理”[3]。然而，在流动与转型时代，“老漂族”所面临的舞台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他们在“前台”(子女的视阈或家庭核心场域内)需要尽力塑造一个任劳任怨、明理健康的“完美长者”和“高效保姆”；而在“后台”(个人的私密情感空间)，则需默默隐藏自身体力不支、社交隔阂和文化失落的真实状态。同时，结合默顿(Merton)的“角色集”(Role Set)理论，“老漂族”随迁后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角色丛，其不仅要承担家庭内部的“照料者”与“家务提供者”角色，还需面对社区邻里、社会交往等异质性关系。相关系统综述亦表明，补充性隔代照料与祖辈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多重因素调节，提示这一照料情境对祖辈而言并非均质的积极体验[4]。当外界(如子女期望、城市文化)对老人的期望与其自身的心理承载、认知结构发生背离时，其角色集内部便会产生结构性冲突，进而产生显著的角色过载、角色中断和角色悬置。

2.3. 社会融入：从边缘他者到共同体建构

生存焦虑是解释随迁老人行为动机的核心变量。一般来说，本体安全源于个体对生活环境一贯性、确定性以及社会关系信任网络的维护[5]。老人们因空间迁徙导致原本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破裂，进入城市后面临极高的本体安全威胁。社会融入并非简单的“物理同化”，而是指流动老人在流入地重新获取“存在感”与“价值感”的心理与行为调适过程。它包括结构的融入(公共资源、福利的可及)和心理的融入(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本文重点关注老人在承受多维生存焦虑时，如何通过能动性实践重建社会关系网络。

3. 冲突的逻辑：双重生存场域下的角色拉扯

在代际抚育的高压剧场中，“老漂族”在不同场域内遭遇了多重角色期望的激烈碰撞，表现为一种分裂式的生存常态[6]。

3.1. 家庭私领域的角色过载：高强度的代际支持

在子代核心家庭中，随迁老人的主要职责是无偿承担繁重的劳务。在“子本位”的现代家庭权力结

构中，老人的生活作息、膳食标准乃至活动范围完全被锁定在孙辈成长和子女工作的刚性时间表内。这种极端的生理与时间消耗直接导致了角色过载。老人们不仅要在体力上应对繁重的育儿琐事，还要在情感上进行长期的“情感劳动”——压抑自我的疲惫与不满，努力呈现家庭和谐的积极面貌，以此确立自己在家庭权力网络中的安全地位。如随迁抚育老人 A 所诉：“每天起早做饭、带孩子，身体再累也不能当着儿媳的面叹气，就怕人家觉得我成了家庭的累赘。”这种典型的“情感劳动”成为其掩盖真实角色负荷、维持前台和谐的常态表现。

3.2. 社区公领域的角色悬置：“工具性照料”下的社会性缺位

与家庭私领域的“全勤角色”相反，“老漂族”在城市社区等公共场域面临着角色悬置的尴尬境遇。他们被禁锢在“家庭”这一狭隘的微观私空间内，缺乏合法的社会身份。在陌生的邻里交往模式和坚硬的城市建筑区隔中，老人们原有的社交角色和邻里互动网络被完全斩断。除推着婴儿车在小区内与同龄流动老人进行浅表性的“育儿交流”外，他们难以参与到社区治理或文娱建设中。老人们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层面的需求和角色被隐形化，沦为无声的社会“隐形人”。

3.3. 代际互动中的自主权让渡：传统家庭权威的重组与变迁

随迁抚育往往伴随家庭微观权力的悄然转移。在传统的农业或熟人社会，长辈凭借丰厚的生活经验掌握着道德和知识的绝对权威；但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都市，年轻子女则垄断了文化、技术、消费方式的话语权。面对复杂的智能家居系统、城市出行规则、乃至科学育儿理论，老人常常陷入“学不会”的无力感。为了维系子代家庭的关系存续，避免引发摩擦，老人不得不主动交出传统长辈的决策权，在生活琐事和育儿观念中对子女无条件地“妥协”和“让渡”，这种传统家庭权威的解构极大地冲击了其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尊严。

4. 融入的困境：多维阻隔下的“防御性”退缩

当技术的冷酷、空间的隔阂与文化的审判相互交织时，“老漂族”在尝试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极易产生受挫感，进而启动防御性的后撤。

4.1. 空间位移引发的功能性阻隔

大城市快节奏的交通系统、层出不穷的扫码操作、复杂的数字公共服务构成了横亘在老人面前的硬性技术壁垒。这种空间与功能性的高门槛引发了老人们深层的“操作焦虑”与“安全恐慌”：由于害怕坐错地铁、不会使用手机挂号、担心网络支付安全，不少老人选择主动退缩，将自己的生活半径极限收缩在步行可及的数公里社区网格内，实施“够用就好”的极简空间实践。这种功能性的退缩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防线，将城市丰富的公共生活阻隔在外。

4.2. 文化壁垒引发的社交性疏离

城市社区中充斥着隐形的文化审判。在代际沟通和邻里互动中，随迁老人因方言障蔽、生活习性差异以及对城市流行话语体系(“梗”)的陌生，极易受到子代家庭或外界的无意调侃与文化否定[7]。为了避免“说错话”、“做错事”带来的羞耻感，老人们往往会采取典型的“沉默螺旋”防御策略：在社区活动中保持绝对沉默，在家庭微信群内做无声的“点赞狂魔”。随迁老人 B 在访谈中提到：“在小区的长椅上，听着别人用本地话聊天，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在儿子的微信群里，我发的东西他们也经常不回，索性我就只点赞、不说话了”。研究表明，这种社交障碍使得随迁老人在城市场域中呈现出“高文化融入–低社交嵌入”的悖论性特征[8]。

4.3. 情感落差引发的情感性孤立

老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自己付出了高额的劳动代价协助子女，但城市并未能赋予他们真实的家园归属感。线上与子代表层、功能性的连接(如微信的交代家务、日常琐碎指令)无法填补其内心的情感荒芜，造成了“数字空巢”的诡谲景象——明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各自处于隔绝的情感世界。老人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只是城市中的“寄居者”与“边缘人”，这种无法逾越的情感鸿沟，迫使其在心理层面对城市和子女产生深度的依赖却又疏离的矛盾感，加剧了其漂泊、寄居的痛苦心理。

4.4. 异质性视角下“老漂族”角色冲突的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老漂族”的角色冲突和融入路径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其一，来源地决定了文化审判的张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转非”型老人，其地缘和经济资本薄弱，往往面临更严峻的角色中断；而从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城转城”型老人，其在公共服务利用和消费适应上更为平滑。其二，经济条件调节着家庭内的代际博弈。拥有独立养老金和经济能力的随迁老人面临的角色冲突显著低于无固定收入、完全依赖子代生活保障的老人。其三，随迁动机的不同也影响其心理调试。主动随迁型老人的再社会化阻抗相对较低，而因“隔代照料责任”被迫随迁的老人，则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生存焦虑。

5. 机制生成：代际支持中角色适应的社会学建构

流动老人在代际互动中表现出的“想融入又怕融入”、“想回家又走不开”的纠结心态，并非偶然，而是由以下三维结构性焦虑在微观场域激烈碰撞并被共同建构的机制所导致的。作为解释随迁老人行为动机与身心健康水平的核心变量，社会融入状态直接影响其晚年福祉[9]。这种焦虑并非无端产生，而是由数字技术逻辑与传统家庭伦理在微观互动场域中激烈碰撞所共同建构的。其具体的生存焦虑生成过程与行为调适博弈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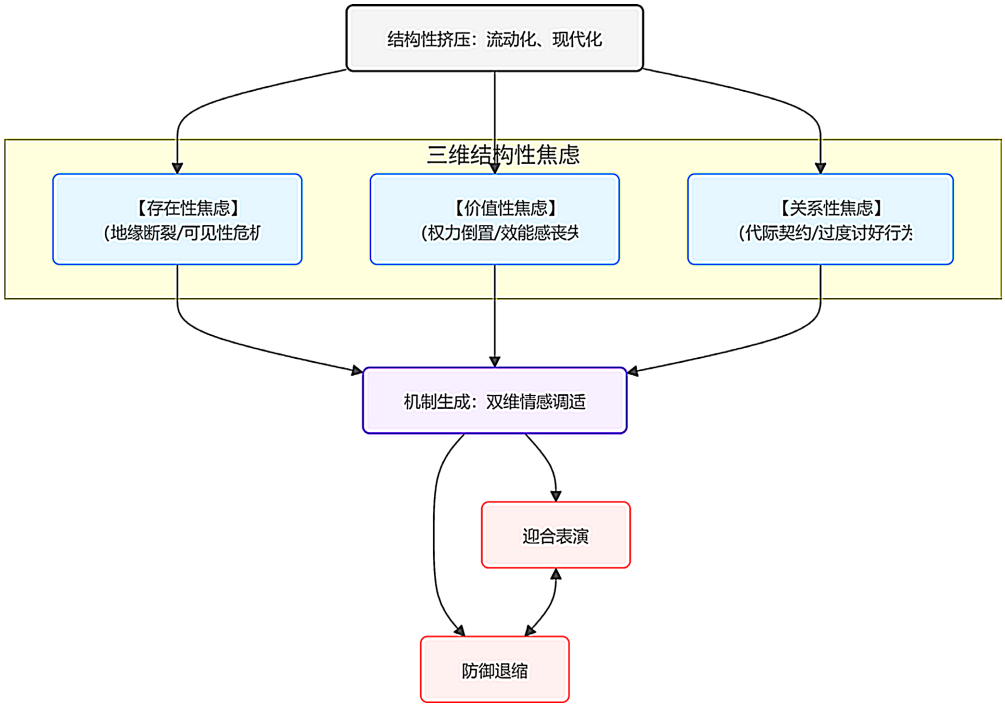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logical mechanism of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role adaptation of “elderly drifters”
图 1. “老漂族”生存焦虑与角色调适的逻辑机制

5.1. 存在性焦虑：地缘断裂下的“无根”体验

数字与流动时代，“可见性”是确立自我存在感的关键标志。在原有的地缘差序网络中，老人们通过高频互访和熟人交往，拥有极高的社会可见性。然而，进入流动性的现代都市后，他们突然沦为了城市汪洋中的“隐形存在”。由于缺乏可交往的同辈和熟悉的社会支持，老人们面临着深层的“可见性危机”。他们时刻生活在“被时代和家庭遗忘”的焦虑中，为了对抗这种存在性危机，他们不得不拼命在家庭内部刷存在感，通过对家务的极致包揽、对孙辈生活的无缝介入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现实价值。

5.2. 价值性焦虑：主体性消逝与自我效能感丧失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老年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而在高度理性的工业文明与都市技术中，老年人在经验与话语体系上瞬间跌入低谷，导致了“文化反哺”带来的严重“代际角色失调”。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体验到一种“老而无用”的极度挫败感。这种价值性焦虑严重摧毁了其内在的自我效能感。为了缓解这一痛点，老人们极易在代际互动中发展出“资源让渡式迎合”——例如通过抢家庭群里的红包等行为，试图重新扮演一个“资源给予者”而非“负担累累”的有用社会角色。

5.3. 关系性焦虑：融入壁垒下的代际角色失调与“讨好”偏轨

在现代城市中，物理空间与文化的阻隔往往与“数字鸿沟”交织。正如相关研究指出，数字时代公共服务与社交网络向线上快速迁移，使得老年群体极易因壁垒陷入社会孤立与边缘化状态[10]。对于随迁的“老漂族”而言，这种数字壁垒直接构成了其社会融入的深层障碍。在社会融入长期受阻、“半融入”状态难以打破的背景下，老人们的代际支持角色变得极为敏感而脆弱。他们时刻担心自己一旦丧失“照料价值”且无法跟上家庭的“数字化节奏”，便会面临被家庭边缘化的角色丧失风险。这种对关系断裂、角色悬置的深度恐惧，使老人们不得不采取一种基于“讨好”取向的互动行为：对子女的任何合理或不合理指令进行迎合、对育儿争端进行无条件妥协，试图以此维系自身在代际结构中的微弱位置，缓解内心的孤立感。

6. 路径重构

消解城市“老漂族”的角色冲突和生存焦虑，绝非流动老人个体的单向心理调适所能解决，而是需要重塑家庭、社区与外部组织协同的生态介入路径，构建起流动的社会资本与保障体系[11]。

6.1. 微观家庭层面：重塑边界清晰、代际均衡的“协商型家庭契约”

家庭作为“老漂族”在城市生活的首要生活场域，必须建立理性的互动逻辑：

厘清照料职责的边界：在家庭日常运行中，应开展平等的家庭协商。明确老人在孙辈育儿中的辅助性地位，避免高负荷的劳务对老人自我社会化空间和闲暇权利的绝对剥夺。

发掘精神层面的情感反哺：年轻子女应主动给予随迁老人情感安抚和支持。在观念冲突时予以理解和保护，提升其在家庭私领域内作为长者的独立价值尊严，减少老人因对关系脆弱性的担忧而产生的讨好型劳作。

6.2. 中观社区层面：激活熟人化微生态，培育组织化的社会交往平台

社区是承接老人社会融入的最关键中介层级。面对随迁老人因社交中断而出现的“防御性退缩”，社区管理部门应主动开展温和干预：

培育同辈非正式支持网络：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老年社工组织等，孵化和扶持流动老人同辈互助自组织。通过组织化的社交网络，让随迁老人在家务之外重建地缘、同辈支持力量。

优化社区代际共融公共空间：在社区微改造中，增设随迁老人友好的聊天角、休息廊椅。多开展邻

里节活动，发掘随迁老人的民俗、手工艺，促使其从封闭的后台走入开放、包容的社区前台。

6.3. 宏观制度层面：消除制度福利壁垒，构建“流动友好型”公共保障体系

“老漂族”在大都市产生的漂泊与无根心态，根源于制度壁垒导致其对流入地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慌。

推进基本福利制度的可携性：进一步简化全国异地医疗保险联网结算，建立更简便、慢病均可带的随迁老人异地就医保障网，彻底解除其在异地突发疾病带来的高成本焦虑。

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准入：彻底取消流动老人使用城市图书馆、老年大学、公共公园、体育场馆的户籍障碍，提供免费、便利的公共服务权益，在制度层面上为“老漂族”扫清身份融入的障碍。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6.

[2] 许加明, 华学成. 流动的老年: “老漂族”的形成机制与多重角色困境[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39-48.

[3]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0-121.

[4] Kim, H.J., Kang, H. and Johnson-Motoyama, M. (2017)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Who Provide Supplementary Grandchild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3**, 118-141. https://doi.org/10.1080/13229400.2016.1194306

[5]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olity Press.

[6] 芦恒, 郑超月. “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J]. 江海学刊, 2016(2): 227-233.

[7] 周晓虹. 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 青年研究, 1988(11): 22-26.

[8] 彭大松. 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7(6): 105-114.

[9] 池上新, 吕师佳. 社会融入与随迁老人的身心健康——基于深圳市调查数据的分析[J]. 深圳社会科学, 2021, 4(5): 95-108.

[10] 钱浩. 网络消费时代老年群体面临的挑战与解决策略[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2227-223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71

[11] 刘素素, 张浩.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8, 18(6): 19-25, 44.